

于
无
声
处
听
惊
雷



——鲁迅与
文网

散木
著



于
无
声
处
听
惊
雷

P

——鲁迅与 文网

◎ 散木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散木著.——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80647-413-7

I. 于… II. 散…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②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808 号

书 名: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

作 者: 散木

出 版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8 万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8.00 元

ISBN7-80647-413-7/I·282

邮政编码: 330006

电话号码: 0791-6893619

(江西省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调换)

目 录

一 国民党文网中不屈的鲁迅	1
鲁迅早年对文网的间接经验——《越铎日报》和它的消亡	
——北国严冬：《新青年》和鲁迅北京时期的几家报刊——南方的血色黄昏：厦门、香港、广州——海上风云	
二 文网下的中国出版界和鲁迅	61
人类历史上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鲁迅所生活的中国	
——荆天棘地中的中国出版界——国民党“文化围剿”下的上海出版界——搏杀和苦斗中的鲁迅——鲁迅和上海几家书店	
——笑看失去威风的破文网	
三 鲁迅与北新书局	175
——鲁迅与书局的个案分析	
李小峰和新潮社以及北新书局的崛起——北新书局第一次被查封——上海“北新”——“北新”的没落	
四 为了内在自由的第二种外部自由	197
——鲁迅和他的经济收入	
自由的内部和外部——鲁迅早年和在北京从事文学运动的经济背景——一个“自由撰稿人”	
五 “盗火”事业	230
——鲁迅解读别国的文网和文网下鲁迅的翻译、出版	

别求新声于异邦——“没有声音的民族”——邻国的文网
和爱罗先珂——俄国的两种文网样板——伟大的俄国知识分子以及中俄知识分子之比较——倾心俄国文学——“盗火”者的炼狱——没有硝烟的搏杀

六 苍凉回眸说禁书 310

——鲁迅的借古喻今

写着中国命运的野史——越人的血脉——鲁迅从野史中看到的古代文网——鲁迅与明清文字狱——鲁迅诠释明清文字狱——借古喻今说文网——解构“性灵”的误读

七 看不见的战线 374

——鲁迅与国民党邮电检查的斗争

民国邮检史——鲁迅所直面的国民党邮检（广东）——鲁迅所直面的国民党邮检（上海）——鲁迅发现的“秘密”——鲁迅反抗邮检的手法——鲁迅书信的劫运

八 冲破重重文网的利器——笔名 397

笔名的历史——鲁迅为什么要用笔名？——有文网就有笔名——鲁迅的笔名

九 谣诼纷飞中的鲁迅 431

——别种形式出现的文网

谣言和流言——伴随着流言和谣言的鲁迅——“京式”和“海式”的流言——谣诼如海，残阳如血——“脑炎”和“逃遁”——“卢布”和“汉奸”

十 《鲁迅全集》出版前后 469

喁喁所望的《鲁迅全集》——“商务”为什么没有出版《鲁迅全集》？——话说鲁迅与“商务”——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围绕《全集》的花絮和余波

十一 两个关于鲁迅与国民党文网的个案	494
鲁迅为什么讨厌邵洵美?——黄萍荪与鲁迅	
主要参考文献	525
后 记	527

一 国民党文网中不屈的鲁迅

鲁迅对以思想和文字获罪的文祸、文网这种现象是不陌生的，在他所曾生活过的晚清、北洋、国民党统治三个时代，他看到的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多了。而他本人后来更成为个中众目睽睽的一个对象，不为别的，因为他是一个本质上的“不遵从者”，他执行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律令，而率性而为的“自由谈”是他的惟一表达方式，这当然不被他所批评、抨击的统治者所能容忍。这样，在他们双方间就构成一个相互纠缠的死结：统治者索求的是“政治正确性”的绝对性和普遍性，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批判家争取的是自由表达和个性的张扬。这种矛盾是根本冲突的。

鲁迅的执著、绝决，都是因此带出的。

一、鲁迅早年对文网的间接经验

实在地说，鲁迅也只是这历史长河中一个凝固和显形的镜头。在他之前，之后，历史依然“太阳底下不会有新东西”地轮回，于是，在鲁迅心头上不时悄悄爬上沮丧、绝望种种鬼气般的心绪，它吞噬着鲁迅



梁启超

的心之一隅，但那黑暗毕竟在他的决绝面前孱弱了，退缩了，溃败了，落荒而去了。

正义是打不倒的，虽然是屡起屡倒、屡倒屡起。

那印痕一定是非常鲜明和刺骨的：他发蒙时爱读的几家报刊——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中国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失败后被查封了；革命派喉舌的《苏报》，因章太炎等放言革命和排满，酿成了沸沸扬扬的“苏报案”，邹容囚死于狱中，章太炎蹲了三年大狱。这是深深印入青年鲁迅脑海中的一个事件，那一对小烈士和老英雄的风采让青年鲁迅敬仰不止。后来鲁迅说及晚清的革命诗文，以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坟·杂忆》），而有“章疯子”之称的章太炎，可谓是鲁迅的精神源头。青年鲁迅后来由私淑其人到领受太炎先生亲炙，推溯源头，无不是章太炎的骨气和精神给他的震撼力使然（“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太炎狱中的几首诗最为其时的鲁迅所喜爱：《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有感于中国近代第一个记者因言获罪被杀的事件而作。沈禹希，也即沈荃）、《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等，鲁迅时加诵读，太炎书《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珍爱的文章。彼时章太炎其人其文，鲁迅晚年回忆：人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其文章也“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后来处“荆天棘地”而战叫、击刃，那背景舞台上都有当年另一个章太炎的影子在。那是青年鲁迅的精神楷模，是他敬仰不止的对象；后来的章太炎却是鲁迅晚年惊觉战士落伍、勇士颓唐的一个教训了；再后来，烈烈陈天华，他湖南人火辣辣的文字烧灼在青年鲁迅的心上，《警世钟》、《猛回头》，也都被清政府判为禁书；“报仇雪耻之乡”的越人、同乡蔡元培们所办的《警钟日报》（前身为《俄事警闻》），这也是鲁迅深爱并多有建议的一份血性报刊，在鲁迅往返仙台和东京时也被清廷封杀于上海。另一位越人陶成章烈士被清廷通缉，通缉书中“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爱看的《民报》，也于章太炎授讲《说文解字》时被日本政府徇清廷之请查封了。



鲁迅在日本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青年鲁迅看到了文字的伟力，也看到了封杀文字的暴虐，这在他以后的文字生涯中，我们还能看到它的赓续和绵延，当然，那更是光彩和惊心动魄的了。

二、《越铎日报》和它的消亡

鲁迅日本留学归国后，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鲁迅在辛亥革命后

从事出版和报刊活动，是在他欲辞去教职赴上海到大书局当编译员遭拒之后的事了。

1912年年初，鲁迅在家乡创办了一张《越铎日报》。这是他在我国走上创办舆论平台的第一步。

武昌起义后，各地“咸与维新”，绍兴知府程赞育也出面组织了军政分府，甚至“秋瑾案”的主谋之一章介眉也当上了治安科长，一切如鲁迅所说：这新政权“内骨子是依旧的”。于是，南社绍兴分社——越社便派代表到杭州，要求革命

军开驻绍兴。革命党人王金发应请开入绍兴，组成了新的军政分府。后来鲁迅回忆：“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但没有多久，王都督被人包围，“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越社纯洁的少年们于是以为要用报纸来执行“第四种权力”，监督、批评新政府，就由宋紫佩找鲁迅商议，鲁迅表示赞成，1月3日，这张报纸就诞生了。

《越铎日报》是鲁迅起的名字：越之铎，绍兴人民给“公仆”敲响的警钟也（“报为道铎，亦为警钟”）。发起人也是鲁迅领衔的三个人（另二人为陈子英、孙

德卿)。鲁迅还是名誉总编辑,他以“黄棘”的笔名题写了创刊词——《〈越铎〉出世辞》,文章警戒众人:中国“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因此需要长久的民主斗争和建设;继之鲁迅揭橥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办报的宗旨——“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它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优良传统。

秉抒发“自由之言议”的精神,《越铎日报》甫问世,以“官威如故,民瘼未苏”,“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还建议开设了一个“稽山镜水”的专栏,专门刊登批评的短评。此外还有《自由言论》等的栏目。当时绍兴有“新民谣”的“光复后十晦气歌”,其中就有“绍兴多一报馆,民贼晦气”一说。及鲁迅初试锋芒,结果就让王金发吃不消,于是“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同上)。所谓“诈取”,是王都督给报馆的一笔经费,取“拿了人家的口短”的道理,《越铎日报》批评都督就是犯了规矩,所以,当王都督又送来五百元后报馆就开会讨论:该不该收他的钱?收了之后还骂不骂?决议竟是照骂不误!那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鲁迅原是反对接受资助的,但报馆的会计责问他不当家不知油盐酱醋的不易,鲁迅只好沉默。其实这点世故鲁迅是知道的,只不过他主张批评要有理有节,也反对轻言牺牲。鲁迅被会计责问后说:“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



鲁迅返国后执教的绍兴中学堂

连累我们的话来，他说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同上)

果然，鲁迅赴南京后，1912年8月，王都督派卫兵捣毁了编辑部。

《越铎日报》上，有周作人以笔名“独”、“独应”等发表的《望越篇》、《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望华国篇》、《民国之征何在》等，这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

的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很早就致力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和传统文化了，所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子遗”（《望越篇》）；他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也是在人们喜庆于民国肇立不久时，周氏兄弟便发出“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民国之征何在》）的疑问。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果然看到一个“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民国”、一个充斥着“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的“民国”、一个“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的“民国”。

在这样的土地上，鲁迅深深感到：“什么都要从

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从此,鲁迅一生都在为一个推翻专制和统制、争得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的民国而不懈地战斗!

三、北国严冬:《新青年》和鲁迅北京时期的几家报刊

(1)在抄古碑的日子里

民国成立——却是鲁迅丝毫感觉不到“民国”的民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准宪法”的《临时约法》所标榜的“人民有书信秘密、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言犹在耳,不久就暴露出它的阶级狭隘性和虚伪性:1912年3月公布的《民国暂行报律》,赫然就有“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等。

最是文字难自由,于是幻想着自由的报人们在“全国报界俱进会”的名义下亟请大总统孙中山撤销此《报律》。孙中山从谏如流,立飭内务部取消之。可是没有多久,袁来孙去,冷了心肠的鲁迅“哀莫大于心死”,只好在书肆的冷摊搜集古碑来讨生活,其时文字狱之严酷也丝毫不减当年色厉内荏的清廷,袁氏王朝统治之下,“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



鲁迅受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

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补树书屋旧事》），鲁迅的抄碑、摩挲金石，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一种“嗜好”。

他所在的教育部，职责所在，也要面对行政干预出版的问题，鲁迅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教育总长张一麋心恶其时已是中国出版中心上海所出版的小说，训诫鲁迅等“宜多为调查，如书肆有贩而私售者，一经查出，必严其罚而火其书，用强制执行之法，务使此种不良之小说驱除无遗”（《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鲁迅也只好虚与委蛇，一面强调“先从事审核”来拖延，一面认真审核，不使不该被查禁的书被列入海淫海盗的坏书中。

（2）多灾多难的《新青年》和鲁迅“出山”

鲁迅文字发表时最早被腰斩、也即他直接面对的文灾，是他“五四”出山后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和梦》，它原来是连载在《国民公报》上的，刊至剧本第三幕第二场时，因报纸刊登了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查禁了，于是只好转刊于同人刊物《新青年》上。

《新青年》也大势不妙，而且可以说从它诞生起就多灾多难。

1919年6月11日，主编陈独秀带着他起草、胡适翻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其中提出对政府“最后最低之要求”中就有“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叫上北大教授的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金事邓初，四人分头跑到“新世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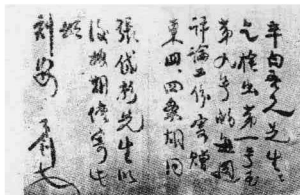
《国民公报》

城南游艺园去散发。陈正好被埋伏的军警逮个正着，好在他是被京师警察厅所捕获的，而没有被另一帮的卫戍司令部的军警抓到。前者的厅长是安徽人吴炳湘，后者的司令则是《宣言》中要求罢免并驱逐出京的段芝贵。吴在安徽在京人士通力保释下对陈这个老乡总算网开一面，段就没有惜才的心思了。说来也是一段感人的场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对垒，并非如后人所想像之必欲你死我活方为快，新派领袖陈独秀被囚，旧派也即桐城派的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联名上书请求开释之，病中将不起的刘师培也颤颤巍巍签名其中。陈被捕后，《新》的编辑部即遭搜查，后来编辑部移往上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更迭遇不幸，先是被包探从印刷厂搜索到文稿，查没后又处罚金，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后陈又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最终停刊了事，新青年社也因内部分歧宣告解体了。

1914年，袁世凯政府公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对报刊和出版作了种种限制，禁止有“淆乱政体者”和“妨碍治安者”等的文字，彼时正是鲁迅“闭关”埋首抄古碑的惨淡岁月，也谈不到因“捣乱”被涉及文字狱的事例。至“五四”钱玄同亟请下鲁迅“破关”而出，由《狂人日记》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时的军阀政治已经在内耗和新思潮冲击下捉襟见肘呈现出颓势，既不能实施有效和强有力的统治，又无法根除世界大势下新思想新思潮的输入以及中国人民的觉醒，尽管有书报和邮电检查的制度，防范洪水猛兽

般的“过激主义”，如1920年2月的查禁八十三种“过激主义印刷物”，以及作为前瞻的“洞见症结，因事补救，不致蹈凭空过当之弊”的内务部“著作及出版物研究委员会”的设立（章士钊任调查员赴欧调研），终究是于事无补、流于形式而不得不放松了对新思潮的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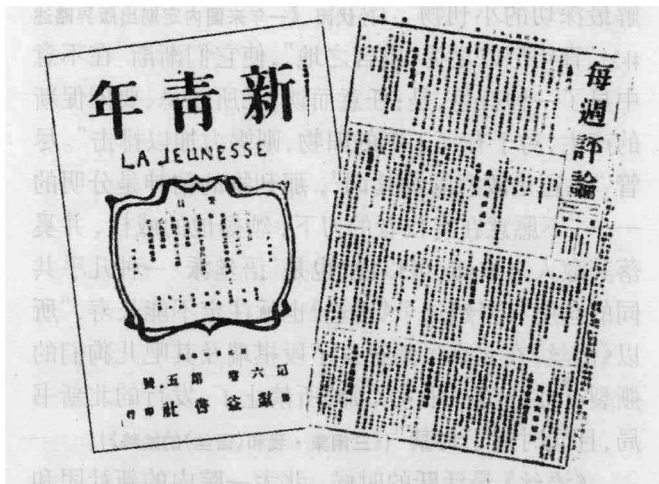
也在新思想新思潮高势位的移植下，“五四”时的中国成为各种新思潮的试验场，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抨击，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而借助“思想自由”的原则又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新青年》等刊物（鲁迅的文章大多刊登在这些刊物上）更策略地躲过了军阀政府的镇压。然而一旦逾越过这道防线，“不谈政治”变成“不能不谈政治”，陈独秀、李大钊这些



李大钊关于《每周评论》的书信

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不须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信仰要变成地上的现实就不得不从实际政治下手，那也就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相结合的开始），像胡适这样有心只谈思想（“易卜生主义”之类的自由主义）和方法（实验、改良）的恂恂儒生，受了压制言论的刺激，不由不站出来以诉求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而有从事舆论的冲动。

继1919年8月《每周评论》、1920年5月《新社会》被查禁，1922年冬北洋政府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人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为意加迫害的对象。胡适忍不住说：“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我等了一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 1922 年 2 月 7 日日记），鲁迅庶几亦如此。

（3）《语丝》、《莽原》以及《新青年》同人的分野

《新青年》之后，鲁迅又相继发起创办了文学刊物《语丝》和《莽原》这一对双胞胎。

虽系文学刊物，创办它们的动因却是政治性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果然，人们对这两刊的印象，就是一个是“自由说话的刊物”，一个是“国内讽刺最利害、挖苦最刻毒、见